

复旦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文化传教的传承——从徐汇中学看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地区的  
文化事业

---

姓名：赵昕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宗教学

---

指导教师：李天纲

---

20070515

##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赵昕 日期：07/06/25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赵昕 导师签名：李元纲 日期：07/06/25

# 中文摘要

耶稣会，是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修会，在中国，它富有开拓性地文化传教，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作为近代耶稣会传教的中心，徐家汇至今仍然保留了一大批一百多年前耶稣会士创办文化事业的痕迹。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一，徐汇中学创办于 1849 年，被誉为我国西洋办学第一校。它是我国境内第一所按西洋办学模式创办的学校，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首开我国西方科学人文教育的先河，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1849 年法籍耶稣会士在上海徐家汇收容中国难民儿童及教友子弟开始启蒙授课，1850 年正式取名圣依纳爵公学，亦称徐汇公学，1931 年更名为徐汇中学，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一度任为校长。1953 年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定名为上海市徐汇中学。作为耶稣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徐汇中学在耶稣会的文化传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对徐汇中学历史发展变迁的考察，初步探讨近代中国教会中学教育建立的历史背景，展示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教育制度遭遇到的困境与教会中学教育得以建立发展的原因，初步揭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主持的徐家汇教育文化事业之特点，以及与上海近代社会变迁之关系，对中国近代社会之贡献，以及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之角色。

**关键词：** 文化传教 徐汇中学 耶稣会

**中图分类号：** B976.1

# Abstract

Society of Jesus is a tale in the history of Catholic. In China, the Jesuits found a road named culture mission. As one part of the missionary project, XuHui middle school was founded in 1849, which was called the first school founded by the West. XuHhui middle school was founded at the middle age of 19<sup>th</sup> century, when Chinese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open the Shanghai city to the West, it was the first school imitated the model of middle schools in west countries;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school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Chinese. In 1849, the French Jesuits accepted the children of refugees and taught them knowledge. In 1850, they founded a school named XuHui College, also named College St Ignacio, then it changed name to XuHui middle school in 1931, MaXiangbo, the originator of Fudan university, had been the headmaster of XuHhui middle school for years. In 1953,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gHai took over this school and changed its name to Shanghai XuHui middle school. As a missionary middle school, XuHui middle school has trained so many talented people in more than 150 years. From the history of XuHui middle school, this article wants to talk about some topics about missionary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by the West in moder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ssionary middle school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XuHui middle school's development in modern ShangHai society, and the XuHui middle school itself in modern China society.

**Keywords:** Society of Jesus, XuHhui middle school, culture mission

## 一、研究综述与方法准备

徐家汇，是今日上海著名的商业文化中心，它的形成可追溯至明代。“徐家汇为晚明相国徐文定公之故乡，以公之子孙世居其地，又以正当肇嘉浜与法华泾水汇合处，因名曰徐家汇。”<sup>1</sup>晚明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的天主教徒徐光启曾经在此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即安葬于此，其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后渐成集镇，因地处肇嘉浜与法华泾两水汇合之处，故得名“徐家汇”。1847年，重返中国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选择徐家汇这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居住地建造耶稣会会院。此后，一批以文传道的耶稣会会士相率入境，兴建教堂，创办学校，传播西方宗教文化，徐家汇地区因此成为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一大批文化教育设施应运而生，至18世纪初期，徐家汇已经成为当时天主教在江南的中心，并因其浓郁的法国文化氛围，被誉为上海的“拉丁区”。

1849年，中国江南地区暴雨成灾，江河泛滥，上海地区难民充斥。徐家汇地区的耶稣会传教士应教友之请，招收难童，设立读经班，提供衣食住宿。1850年正式建立学校，奉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年）为主保，故取名“圣依纳爵公学”（College St Ignacio），“公学”源自欧洲英法等国学制，指经济上不依靠政府的私立学校。<sup>3</sup>因学校地处徐家汇，又称“徐家汇公学”，简称“徐汇公学”，时有学生31人，教员4人，由当时的徐家汇圣依纳爵天主堂传教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年）为院长。

经过十余年发展，徐汇公学规模不断壮大，渐成天主教在上海的最著名的学校之一。据1920年统计，是年该校有学生450人，历年在校学生累计3800余人。期间，徐汇公学共培养耶稣会司铎26人，传教会司铎68人，修士27人，中学毕业生112人，高等小学毕业生一千余人。1933年，徐汇公学立案改制，更名为徐汇中学。1953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公立上海市徐汇中学。

徐汇中学是按西洋办学模式创办的学校，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首开我国西方科学文化教育的先河，被誉为我国“西洋办学第一校”。作为教会学校，徐汇中学主要为天主教机构培养人才，但也并不强迫学生入教，1904年更区分管理教外学生和教内学生，学生来源也随着学校声誉的提高而逐渐由穷人子弟向富家子弟过渡。一百五十余年来，徐汇中学培养了众多教内外的优秀人才，成为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模式和“文化传教”的代表之作，也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因此，考察近代徐家汇地区耶稣会的文化事业，特别是其中以徐汇中学为代

表的学校教育、传教机构、文化科学服务设施等，对于探讨明清之际，特别是19世纪开始耶稣会在中国江南地区的文化传教策略的特点与意义，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近代上海文化形成的影响，以及近代上海天主教会的本土化与世俗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而在2004年以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近代基督宗教在华文化教育事业的研究基本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而对于中等教育这一研究领域基本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2005年，本人参加了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国基督教中等教育研究项目”，通过前期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和充分吸收借鉴与会的同道、老师们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本课题拟分为以下几个方向开展进行：

首先，比较16至17世纪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历程与19世纪耶稣会在中国，特别是他们重返上海之后的传教经历，重点是不同传教路线与方式以及其效果的比较，以及通过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前后不同的社会背景的比较，初步揭示19世纪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困境，以及上海开埠后所带来的文化冲击，耶稣会的特点，何谓“文化传教”，初步探讨两个时代的耶稣会士们前后选择不同传教方式，以及同样采用了“文化传教”的路线，却获得不甚相同的社会影响与结果的原因所在。

其次，通过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理清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的文化事业，特别是徐家汇天主堂、徐汇中学、徐家汇观象台和徐家汇藏书楼等现存的重要历史建筑，考察耶稣会的文化事业在上海是如何建立起来，以及它们一百多年的发展变迁历史。通过对耶稣会传教与文化事业发展变迁的研究，如有可能并结合与上海地区其他天主教和基督教差会教派的比较，初步揭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主持的文化事业之特点，其在传教学上的意义，以及与上海近代社会变迁之关系，和其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之角色。

再次，作为宗教学专业的研究生，本论文主要对宗教教育、宗教文化事业在天主教，特别是19世纪徐家汇地区的耶稣会传教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正当性感兴趣。通过耶稣会在徐家汇地区的一百多年的实践，观察教会文化事业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发生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初步认为：耶稣会在徐家汇所创办的文化事业，包括了教育机构、传教机构、科学文化机构、慈善事业机构等，所涉领域全面广泛，经过耶稣会多年经营，颇具规模，使得徐家汇逐渐成为上海摊的商业文化中心，形成了著名的“上海拉丁区”，这同时也是耶稣会文化传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耶稣会通过兴办文化事业，促进了徐家汇迅速成为江南传教的重镇，

也使得徐家汇引领了上海的近代化，在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前后两代耶稣会人所面临的也是实质上已经截然不同的中国社会，他们对于“文化传教”的精髓和态度的理解亦不尽相同，在开创文化事业的同时，却并不能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的作用与效果也不相同，其中的缘由，亦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内容。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资料的搜集与实地考察，采用宗教学、教育学、历史学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在文献资料方面，上海市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有天主教上海教区的大量图书资料。另外，上海档案馆在五十年代以后收藏的教会、教会大学和教会中学文献档案中也有不少文献。上海市徐汇区档案馆也收藏有相当部分徐家汇地区的历史原始资料，包括历史记载回忆，有关刊物杂志，有关存档文件，相关规章制度等，其中也有不少有意义的资料值得整理。复旦大学档案馆、图书馆也收藏有部分有关近代上海天主教的图书资料。1953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天主教震旦大学图书馆的文科图书全部并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其中更是包括了早期天主教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大量文献。以上这些资料，都是值得发掘和利用的。

## 二、富有传奇色彩的耶稣会

### 1、耶稣会及其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耶稣会，亦称“耶稣连队”，是天主教历史上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重要修会。1491年，伊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出生于西班牙北部阿斯佩蒂亚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祖上据说是古老的巴斯克贵族，他是这个家庭的第十三个孩子。但是少年时代的罗耀拉似乎对神职事务并不感兴趣，父亲把他作为宫廷侍童送入伊莎贝拉女王的宫廷主管府中接受教育，这段时期，受到家庭传统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他沉迷于骑士和战争的梦想。1517年，年轻的罗耀拉骑士加入了军队，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然而，1521年西班牙与法国发生冲突，在潘普洛纳的战斗中，罗耀拉右腿被炸断，左腿也严重受伤，为此，他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经历了四次手术，虽然死里逃生，却不得不盘桓于病榻之上。在家乡养伤期何，因为没有自己喜爱的骑士读物，于是在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嫂子马格达莱娜的引导下，罗耀拉开始阅读基督和圣徒的传记，这促使他的一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期间，罗耀拉读了卡尔都西修士萨克森的鲁道夫写的《基督传》和13世纪多明我会士雅古比·德·沃兰吉所著《圣徒传》的改写本，这两本书对他影响至深。罗耀拉决定抛弃空虚的生活，忏悔自己恣肆好战的过去，仿效圣徒，跟随基督，做一名耶稣的战士，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教会<sup>1</sup>。

1522年1月，罗耀拉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途中读到了他钟爱一生的书——《效法基督》。8月，罗耀拉到达耶路撒冷，但因为圣地护卫者方济各会士的阻拦，他没有实现留在圣地的热切愿望。这次朝圣使罗耀拉认识到留在耶路撒冷不是上帝的旨意，经过再三考虑和祈祷，他确立了当神父的目标，并决定学习拉丁语，为进入大学深造做准备。罗耀拉曾先后就读于阿尔卡拉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1528年，罗耀拉来到巴黎大学，首先就读于蒙太古学院，一年半后完成了拉丁文法和修辞的学习，并于1529年转入圣-巴布学院继续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彼得·法伯尔和方济各·沙勿略。1532年，罗耀拉也完成了人文课程的学习，1533年参加考试，1534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时，他还在一个多明我修道院学习了神学。此时，罗耀拉的身边已经聚集了六位同伴，除法伯尔和沙勿略外，还有巴黎大学的学生迪格·莱内斯、阿方索·萨尔梅龙、尼古拉斯·博瓦迪利亚、西蒙·罗德里格斯。1534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在巴黎蒙马特尔山上的一个小教堂里，由法伯尔主祭，他们共同宣誓神贫、贞洁、朝谒圣地，志愿献身于耶路撒冷城天主之国的的工作，为了“愈显主荣”结为一个团体，这件事情后来则



被看作是耶稣会的发端。1539年初，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激烈讨论后，罗耀拉等人决定申请成为一个正规的僧侣团体，并拟定了一份草案呈给当时两位有影响的虔诚改革派——红衣主教孔塔里尼和多名我会士巴迪亚，由他们亲自送达教皇。<sup>5</sup>在争论了15个月之后，1540年9月，教宗保罗三世（Paul III）终于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1541年4月，罗耀拉当选为首任总会长。

16、17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欧洲的半壁江山已经背离了罗马，或者即将分裂出去。新教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上层社会、贵族和城市市民阶层中，甚至是天主教会的神学家和神父中。此时传统而庞大的天主教修会依旧坚守着隐修院内“出世”的集体生活，只能对新教的攻击表示愤慨而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奋起还击，罗马天主教会在马丁路德和人文主义的冲击下一时间显得岌岌可危，面对着必须革新自身弊端的迫切需要。此时，罗耀拉的耶稣会挺身而出，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面貌投入到了恢复和维护教宗属灵的权力和世俗影响力的“战斗”中。罗耀拉或许认为，建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修会其实于事无补，在幽深的修道院里就可以主宰世界灵魂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于是耶稣会一方面有意识地将自己之于现存的以教宗为首的天主教会等级制度之中，另一方面实行各种有关信仰和教会的改良措施。与其他传统修会有着显著不同的是，耶稣会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式的，纪律森严，等级严密。强调灵修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对于会士进行长期、系统、严格的语言文化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培训。耶稣会要求会士积极“入世”，与当下的世界相融合，广泛容纳时代的观念和吸收时代的精神，参与并关注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贯彻“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的原则，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上层社会和那些对于信仰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的阶层。耶稣会士们一方面隶属同一个修会，遵从着同一个会长，服从于同一套会规和纪律；另一方面，他们又穿着自己的修士服，在世间的生活中为实现修会的目标而行动。不仅如此，耶稣会还积极参与天主教海外传教活动，尤其是重点向亚洲和美洲开拓新的传教路线。同时，以其广博的学识优势，发展文化事业，吸收和利用一切可以为之所用的资源，注重人的个性与文化活动，在某些方面与新教的做法乃至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的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在罗耀拉的主持下，耶稣会迅速发展，很快便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全球性修会。

起初，罗耀拉对教育事业并不甚热心，他认为教育是一项必须的但又卑下的工作，除非是作为苦行补赎，否则很难适合教士和修士，因此当时耶稣会教育的目的仅仅是小规模地培养未来的耶稣会士。但罗耀拉很快认识到要实现耶稣会的目标，仅仅依靠布道、接受忏悔和传授教义是远远不够的，1548年在西西里开设的第一所向大众提供教育的耶稣会学校——墨西拿学院和1549年开设的巴勒

莫学院出人意料的成功，使罗耀拉改变了对耶稣会教育事业态度，并对这一事业寄予厚望<sup>6</sup>，在罗耀拉自己拟定的《耶稣会章程》中，便有关于教育的简要计划。从1551年起，耶稣会学校便以每年递增四五所的速度发展，很快遍布欧洲的大中城市，初期免费授课的义务教育吸引着各阶层学生的涌入，教育成为耶稣会重要的工作领域，人文中学也成为耶稣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中世纪时期欧洲的经院式教育萌芽于教堂和修道院的庭院内，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作为天主教会事工的一部分发展起来，宗教成为学校教育的本质与目的。然而宗教教育在灌输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不得不对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有所借鉴，教会为了捍卫和传播自身，不得不仰赖于古代文明的文化，因而看似纯然神圣性的教会教育事业却也不可避免地孕育着世俗的人文的精神和原则。文艺复兴运动的爆发，带来了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他不再将辩证法三段论作为知识的核心，也不认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才是教育的最高工具，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使学生具备赏析古代经典巨著的能力并从精神上仿而效之，而是首先强调人类世俗的现实以及人的能力，关注于培养和训练学生自我表达的技艺、文学的才能和竞争的精神<sup>7</sup>。为了将耶稣会的教育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1584年，耶稣会的第四任会长阿奎维瓦神父指定成立了一个来自不同教区的六人委员会来负责拟定一个标准的教育计划。委员会用两年多的时间走访和调查了各地的教育现状，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学校教学活动，相互商议后形成了一份报告草案，经过罗马学院十二位神父的修订后，在各教区学院试行，最后经反复讨论修订调整，终于在1599年的耶稣会第五次修会大会上定稿通过，这便是广为人知的《教育章程》(Ratio Studiorum)。该章程对耶稣会学校的学级编制、学校设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考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由于其权威性，迅速成为了所有耶稣会学校的教学准绳。它堪称耶稣会教育的全面总结，也反映出当时欧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sup>8</sup>。在整个17世纪，它使耶稣会管辖的教育事业，在较高水平上保持了经久不衰的活力。

根据《教育章程》，在耶稣会学校中，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掌握知识的情况，把学生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和班级，采取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在耶稣会学院初级阶段，学生最初接受的是读、写、算的启蒙教育，即对他们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训练，侧重文法及基本知识的学习，然后教授算术和史地，再加上儿童自幼接受的宗教教育，恰好完成了以读(Reading)、写(Writing)、算(Arithmetic)和宗教(Religion)为主的教育，即通常所谓的“4R”教育<sup>9</sup>。此外，一些初级阶段的学生还开始被教授研究拉丁语的语法学和修辞学，以培养他们通过阅读和模仿罗马古典作家的作品及其风格来进行演说和写作的能力，并教授希腊文，这些课程已超出一般初等教育的范围。罗耀拉曾明确规定学生应在人文学科的基础上，学

习哲学和神学。他认为人文教育是基石，“神学的学习和运用都需要（尤其在这个时代）人文、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知识，应当有足够数量的通晓这些语言的有能力的教授。”在高级阶段，学生则主要学习神学和哲学，后来也遵循时代的进步，逐渐开设了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课程。第一学年开设的课程是逻辑学，学生主要学习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形式逻辑，目的在于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其它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学完逻辑学后，学生于第二学年、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再循序学习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神学、数学和伦理学。在语文教学中，拉丁文占据了重要地位，它是学校学生互相交流的通用语言。在哲学方面，采用的是经过天主教会筛选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神学上，则把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作为神学研究的基础和必读科目。完成上述学业后，学生进而分途选修各种专业课程，如神学、法学和医学，接受专业的训练。在《教育章程》中，对于学生的学习、复习和考核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此外还采取各种奖惩措施和利用竞争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进教学效果。在学业上严格要求的同时，耶稣会学校还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公开辩论、戏剧演出、假日旅游、以及进行游泳、骑马、射箭等体育赛事活动等，丰富学生的生活，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而在学生的日常管理上，耶稣会则广泛采用监督机制，此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必要时也使用体罚。在意大利，耶稣会学校使用了堪称残酷的手段，包括监禁和饥饿。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耶稣会将人文主义和宗教教育结合了起来，通过人文教育的方法和手段，着力培养学生在文化科学知识领域打下扎实基础的同时，更将他们培养成为了“基督的战士”。很快，在天主教国家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各界的高官名流、知名学者，几乎都在耶稣会的学校学习过或者从耶稣会的学校毕业，耶稣会的教育培养了当时欧洲社会的众多精英人才。

## 2、近代徐家汇的耶稣会文化事业

上海，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北濒长江，南临杭州湾，西接江浙两省，号称“襟江带海、腹地广阔”。清前期，上海地区设上海县，属松江府管辖。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6月，英军攻占上海。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于1843年11月正式开辟为商埠。由此，上海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本地的文化传统中，移民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在开埠之后变得更加明显，据当时的外侨记载：“上海人温文尔雅，……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虽然他们不是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但至少愿意和外侨半推半就地接近。”<sup>10</sup>这种文化，也成为了开埠后上海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外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流重镇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上海的教育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由县学、书院和义学构成学校

教育的基本结构。但到了开埠之前，上海本地的教育事业已经衰落了，据当时的县志记载，1814年间，上海仅有一所县学，两所书院和一所义学，县学每年招收学生不足十人，书院也仅有二十余名学生，可谓凋敝。而这些县学和书院又都集中于当时上海县的中心地带，也就是传统所称的“老城厢”，原上海市的南市区一带。其他很多地方，比如开埠后成为租界的现今繁华的卢湾、徐汇、静安、虹口等地，当时都还是荒芜的田野，除了极少数的私塾之外，几乎是没有学校的存在的。当时县学和书院的主要教授，也是训练“举业”为主，也就是为科举考试训练和培养人才。可以说，开埠之前，上海的地方传统教育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随着上海的开放，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的文化教育领域，面临着一块广阔的天地。

其实，对于天主教耶稣会来说，上海并非陌生之地。早在耶稣会创建之初，罗耀拉就把外方传教作为耶稣会的重要使命和工作之一。最先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是圣方济各·沙勿略。1542年5月，沙勿略到印度果阿传教，1549年8月抵达日本鹿儿岛。当时的日本，佛教盛行，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促使沙勿略决心向中国传道，认为只要中国人真心皈依基督后，日本人自然会放弃从中国传入的佛学而皈依天主。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明王朝统治时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1552年8月，沙勿略辗转来到了广东省上川岛，却一直无法进入中国大陆内地，12月，沙勿略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死在上川岛的一所茅棚中。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很快就就在澳门建立了教区。作为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的制定者，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要求耶稣会传教士们不但要努力学习读、写、说中文，还要尽量熟悉和适应中国的习俗。然而虽经百般努力，耶稣会士却一直未能进入中国内地。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奉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之召抵达澳门，开始研习汉语，了解中国的情况，为进入中国传教做准备。1583年，经过努力，利玛窦跟随之前已经进入过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来到广东肇庆并获准留居传教，从而开始了耶稣会士的中国传教之旅。此后数年，利玛窦辗转各地，一方面结交官绅，攻读中国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宣扬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为的是进入北京，得到朝廷允许，以便于传教。1601年，在一些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利玛窦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终于进入北京，向明神宗上奏疏和进献礼品。后被准予留住北京宣武门内建堂传教。于是，利玛窦在北京继续广交朋友，著书立说，传播西学，并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利玛窦的传教成果是显著的，受洗人数的不断增长，特别是被称为“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位江南士大夫的入教，“文化传教”的新思路得以深入人心。其后一百多年间，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金尼阁、白晋、蒋有仁、艾儒略、利类思、戴进贤等一大批精通欧洲近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物理学的耶稣会士先后进入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与中国学者合作译书，著书修历，制造科学仪器，并长期服务于明清两

朝的钦天监，其中不少人在当时传播西学和学术译著等方面颇有建树，深受中国学者敬重。

利玛窦的“文化传教”策略并非是其别出心裁的独创。一方面，利玛窦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庞大的古老文明国家，有着唯我独尊的专制制度和完备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体系。当时的中国的精英视西方为蛮夷并深信自身的优越性，因而利玛窦认为：“不可能直截了当地改变这个国家的信仰，中国人是如此的深信他们比蛮夷优越，以至首先应当使他们改变轻视欧洲人的态度……应当让中国人看到西方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渐以学术收揽人心。”<sup>11</sup>于是贯彻“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的原则，尊重并学习中国文化，并通过介绍西洋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结交并融入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用中国文化来诠释和传播天主教的思想，从而争取士大夫直至皇帝的支持，而达到在中国内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传教”的策略在更深的思想层次，更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席卷下欧洲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耶稣会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

从本质上来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要求现代精神的解放和主体性、个人精神、理性文明的发展。但从其出发点看，文艺复兴对人性的过分高扬和对科学理性的过分崇拜，滋生了玩世不恭的纵欲主义和对基督教信仰的威胁，而宗教改革在重新强调了基督教信仰纯洁性的同时似乎也偏离了文艺复兴所主张的世俗人文主义方向。创立耶稣会的罗耀拉则试图在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保留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耶稣会看来，以光耀文艺复兴的成就为借口把中世纪说成荒唐可笑或用狭隘闭塞地尊崇中世纪来藐视文艺复兴的成就，都是既违反信仰也违反理性的。对古典文化和新知识的真诚热爱，是极其密合无间地与基督教原理浑为一体的。耶稣会士在从事人文主义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注意防止知识对信仰和道德的危害，并积极参与科学新发展的活动。在利玛窦加入耶稣会之前，耶稣会就以其传教布道的创新精神而享有盛誉，其传教方式力求从俗、宽大，强调要适应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人文主义，其实并不仅仅是指由于熟悉希腊罗马文艺而致的思想心灵修养以及对这种学习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超越于一切个体文化的要求实现人类理想典型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个人差异和民族区别之上，存在着知识和文化的亲和力，利玛窦和他的继任者则发现了这样一条联结着东西方的纽带。

也正是因为徐光启的巨大影响力和声望，其上海的住宅便逐渐发展成为了附近地区天主教宗教信仰的发源地，当地，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徐家汇地区的很多农民都归化信奉了天主教。十八世纪初期，江苏已有十万名教友，而其中的八万余人就在上海及其附近。上海，成为了当时天主教在江南的中心。随后，虽然经历中国礼仪之争和耶稣会在欧洲被取缔等一系列波折，但在江南，天主教的信仰

与地下的秘密传教活动依然得以延续。

1842年，三个法国耶稣会士——南格禄、艾方济和李雅明在法国军舰的保护下，在沉寂了几乎整整七十年之后，成为新一代耶稣会士的第一支先遣队重返中国。有趣的是这三人分别为自己选择了中国的姓氏——南、艾和李，一方面是他们向他们的先辈南怀仁、艾儒略和利玛窦表示敬意，另一方面或许也表明了他们希望继承前人的事业，恢复耶稣会在中国的荣光的理想信念。然而，来到中国之后，南格禄等人发现，前往北京恢复他们前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已经变得困难重重。首先是当时中国内地对于外国人依然是封闭的，通过内地进入北京困难很大；其次，法国遣使会从1875年开始已经在北京和南京教区取代了耶稣会，他们并不希望耶稣会重返北京，而耶稣会也不想与遣使会结怨；再者，法国的耶稣省会也不愿意为前往北京之旅提供所需要的大量经费支持。<sup>12</sup>更为重要的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在新一代耶稣会士心中，是否还占有如在老一代耶稣会士心中如此之高的地位，也会是导致他们是否决心重返上层传教路线的内在原因之一。因此，重返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决定待在上海，一方面期待环境的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在当地天主教传统的基础上，耶稣会很快就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开始了传教的活动。1847年，耶稣会选中了徐家汇，创办会所。此后，徐家汇的教会建筑不断得到扩建与增加，19世纪50年代，因其重要的地位，徐家汇与上海并列成为天主教江南教区七个总铎区之一。

1847年，耶稣会修院从青浦横塘迁至徐家汇，传教士便创办了藏书室，开始搜集年画、地图、家谱、碑拓等文物资料，并编撰、印刷西文图书，从事中西翻译。1897年，由于藏书日渐丰富，藏书室从光启墓旁迁到肇家浜旁，重建了一幢两层13间的藏书楼，用于放置越来越多的藏书；1906年，藏书楼被正式定名为“徐家汇藏书楼”，并沿用至今。当时藏书楼分上下两层，上层为西洋书籍，大多是希腊文、法文、英文、德文版图书，约有8万余册，其中有许多是古本书。下层为中文书，约12万册，志书2100余种，还有全国各地有名的碑帖，都分门别类，并编有卡片目录。

1851年，当时徐家汇地区的耶稣会会院附近已经开设了神学院和徐汇公学，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小教堂显得狭小而无法举行重大的宗教仪式。于是耶稣会决定建造一座正式的教堂。而随着徐家汇地区的教友数目在19世纪80年代后不断增加，1904年，教会开始建造一座新的大教堂，1910年10月22日，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大教堂落成，举行祝圣仪式，这便是当年曾誉为远东最壮观宏丽的天主堂——徐家汇天主堂。

1864年，耶稣会组织人力将徐家汇地区土山湾的土阜削平，把原创办于青浦横塘的育婴堂迁到这里，创设土山湾孤儿院。在80多亩土地上，先后建起了

慈母堂、小学校和木工部、五金部、中西鞋作、图画馆、印刷所和照相馆等部门。据统计，从孤儿院开办至1934年的70年间，土山湾孤儿院先后收养孤儿约2500人。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土山湾更是创造了诸多“之最”：最早出品彩绘玻璃、最早开办照相馆、最早在中国组建西洋画室“加西法画室”、最早组建由中国人组成的西洋管弦乐队、最早采用石印和珂罗版（俗称玻璃版）印刷技术等。在土山湾孤儿院各部门中，以图画馆和印刷所最为著名，影响最大。土山湾图画馆是孤儿院最早设立的部门之一，由西班牙辅理修士范廷佐开创。图画馆分为图画间和雕刻间，图画间从欧洲引进了西洋绘画艺术，有铅笔画、水彩画、木炭画、油画等；雕塑间包括塑像、木雕、木刻等西洋雕塑艺术。因其最早介绍西洋美术到中国来，并且培育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美术家，因此土山湾图画馆被徐悲鸿先生称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土山湾印书馆则从19世纪中叶开始，先后使用传统的木版印刷、活体铅字印刷、石印技术和珂罗版工艺，印行了大量中外书刊，被传教士们认为是上海教区最活跃、最得力的传教工具。其中不少出版物还寄往国外，使土山湾印书馆在国际上也有影响。1920年的《圣教杂志》为纪念土山湾印刷所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印刷所所有之成效，所出书籍、圣心报、圣教杂志、教科书、圣像等件，不止流传于江南地方，竟通行中国二十四省外，至安南、日本、暹罗、缅甸、南洋、欧美各国。凡有中国侨民所至之处，无不用土山湾所出书籍。”<sup>13</sup>

1868年，精通物理学和动植物学的法籍耶稣会士韩伯禄（Pierre Heude）发起创立了上海第一所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院中搜罗各种珍禽异兽水族昆虫等，都制成栩栩如生的标本，院内还设藏书楼，专收中西动植物科学善本。后因场所偏狭，难以扩建，博物院迁移至震旦大学内。

1872年，在天主教江南教区郎怀仁（Languillat）主教与耶稣会江南传教会会长谷振声（A. Della Corte）主持下，“江南科学委员会”成立，随后，在高龙鞏神父领导下，开始在徐家汇地区筹建一座“与耶稣会相称”的观象台。1873年9月，在肇嘉浜畔的小村内，几间非常简陋的平屋，标志着徐家汇观象台的最初建成。1901年在徐光启墓东首辟地建起了新台。新台建有砖木结构的测风塔，装有贝克莱风向风速仪和法国大鸣钟，其后业务不断发展，成为远东闻名的观象台，也使徐家汇成为世界最大私立研究气象机关的中心。而除了提供气象服务之外，徐家汇观象台也起到了“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来愈显天主的光荣，拯救人们的灵魂，为宗教事业服务”的目的。

至20世纪30年代，法国巴黎省耶稣会在徐家汇周围建立了21所宗教性事业机构，其中教会办事机构6所，教育事业机构7所，文化科技医疗事业机构5所，社会慈善事业机构3所。当时的徐家汇已有“天主堂，耶稣会修院，大小修

道院，徐汇公学，徐汇师范，类思小学，藏书楼，天文台，圣教杂志社，圣心报馆，土山湾育婴堂，圣衣院，圣母院，善牧院十余所。”“成为耶稣会在江南的传教中心和总部。而其中的徐汇公学，更是被誉为“西洋办学第一校”，成为耶稣会在华文化教育事业的典范之作。



### 三、近代上海历史中的徐汇中学

#### 1、徐汇中学的创办始末

1849年五、六月间，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霪雨成灾，江河横溢，汪洋一片，上海地区难民充斥。当时的耶稣会士在信中提到：“一连六个星期，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人们说整个帝国的江河齐泛滥了，这大概是指我们周围的几个省而言；农村淹水两三尺深，人们在田里撑船行走；粮食淹在水里都腐烂了。……在上海除了一般的平民之外，突然增加了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农民。两个月来这些人日日夜夜麇集在马路上，受尽了煎熬；大部分人被活活地冻死、饿死。”<sup>16</sup>灾区的耶稣会教友也都聚集在徐家汇，耶稣会会士在救济受灾教友的同时，经过与地方人士商量，决定在教会的支持下，设法收容失学儿童，并施以教育。当时，除了教友恳求神父收留他们无力抚养的男孩外，一些教外人也把自己的孩子送给神父。起初，招收难童12名，其中，有6人是教外孩童，但不久之后领洗。借会所一角的几间茅草屋设立读经班，由一个教徒老先生；来教孩童们读书，并提供衣食住宿。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正式建立学校，奉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年）为主保，故取名“圣依纳爵公学”（College St Ignacio），“公学”即意为公教学校，因学校地处徐家汇，又称“徐家汇公学”，简称“徐汇公学”。时有学生31人，教员4人。1852年起，由当时的徐家汇圣依纳爵天主堂司铎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年）出任院长。

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年），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人，耶稣会士，转入法国耶稣会后，于1848年来华，当时年仅22岁，在上海徐家汇刻苦学习中文，钻研汉语，并且熟读儒家经典，造诣很高。1850年成为了上海地区最年轻的外国神父，1852年任为徐汇公学的首任院长。他在1852年到1874年的22年中，担任院长职务15年，为徐汇公学的发展辛劳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师生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因此被称为这个学校的“真正创始人”。晁德莅神父作为一个教育家在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同时，也作为一个汉学家向西方介绍中国语言文学。清光绪五到八年（1879—1882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陆续出版过他编译的拉丁文《中国文学教程》，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

徐汇公学成立后，学生数逐年增加，在教会的支持和教友的捐助下，徐汇中学不断扩建校舍。于1851年，修葺老屋，增设教室，1878年建三层大楼一座，后加筑一层，接着又添建西校舍，1905年，开辟运动操场，1918年，更是建成

了四层大厦一座。其学校建筑规模，在当时上海的中学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徐汇公学成立之初，即定位于“纯粹中国学校，国文授课”<sup>16</sup>，新生主要攻读国文，包括读古文、练字和作文，与当时的中国传统教育基本相当。创立之初的徐汇公学有教员4人，其中就有一位姓沈的举人。当时科举并未废除，教育学生学习的目的就在于参加科举考试。每当县考之时，徐汇公学的学生亦可入场考试，至光绪元年（1875年），公学学生中共有20余人中了秀才。1874年到1875年，一位《中国通讯》杂志的编者曾生动地描述了徐汇公学一天的教学活动情况：“学生们用震耳的声音朗诵经典作品，每个学生反复大声读唱从未有人给他讲解过的课文；这里是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背书时学生的头摇来摇去，甚至全身都左右摇摆起来；书法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课，因为学生识字的多少和写字笔法的挺秀，也常常是衡量一个人才学高低的标准；上讲解课时，老师讲解学生们已经被得滚瓜烂熟而几乎一句也不动的渊博的古文；最后是作文课，年龄最高的学生在学作奇特的八股文。有一位进士和两位举人为他们批改作业，学生们很关心老师的评语。”<sup>17</sup>传统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固然可以帮助学校迅速地融入中国社会，但是显然耶稣会的神父们是不满意的，他们认为“这种老式的教育法不太理想，太限制约束了学生们的智力。”<sup>18</sup>于是，公学逐步开始引入近代教育体制，先后增设了法文、数理、图画、音乐等课程，供入校较久程度优秀的学生修习。1862年，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神学院）成立，有志修道的教内学生即可入学，马相伯、李问渔、蒋邑虚等11人成为了初学院的首批初学修士。1889年，法文与科学科目成为学生的必修科目。

1900年后，因为社会倡导科学以振兴实业，加之上海洋场内英文的逐渐盛行，徐汇公学更改课程设置，于1904年增设英文课程，学生除学习国文外，可以在英文和法文中任选一科，并用英文和法文向学习程度较高者教授数学、物理、史地等课程。1904年，由于教内外学生数的增加，故采取教外生与教内生分院的模式，以便于学校的管理。

此时的徐汇公学，已经逐渐走上正规的办学模式，也具有着耶稣会学校和中国本地学校的双重特色。在1914年版的徐汇公学的章程中，则明确规定了办学的宗旨原则<sup>19</sup>：公学的第一宗旨是培养教内学生，要求人人认识圣教要理，对自己、社会、国家责任与道德要求，成为造优热心高明的教友，对教会真切信仰的教民。同时，公学亦培养于国家高尚爱国的国民，培养教外学生，塑造品质，共聚一堂，消除戎见。对于学生入教问题，则不强迫教外学生入教，入教须得父兄同意，自由选择，不过也还是希望能够争取教外学生多多入教。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依照当时的教育部所颁布的学制，徐汇公学改为高等小学三年制和中学四年制。随着20世纪初叶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

教会学校纷纷转向政府立案，1931年，徐汇公学组织校董会，向政府办理立案，并且正式定名为“徐汇中学”。学制也依照教育局的规定改为“三三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并由耶稣会士张家树担任首任中国籍校长。张家树担任校长后，学校进行了多项改革，各项制度日臻完善。

1931年，在徐汇公学担任文书工作和透视画老师的修士田若瑟还为公学设计更新了校徽。校徽的形状和图案的意义，都源自圣经，并且具有很浓的耶稣会特色。校徽经不断修改，至1934年最终确定成型。校徽呈立体的盾牌状，分内外两层，周围的五个拉丁字。中间的利剑，象征教会（十字架）和力量，代表比宝剑更锐利的天主之言，可以直穿人的灵魂、关节和骨髓，可以分辨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来四：12—13）<sup>20</sup>。剑的两侧是小篆体的“徐汇”两字。盾牌的形状，是代表能扑灭恶人火箭的武器。归纳起来，就是教导学生要做基督的精兵，以圣经的话语作利剑，去明辨人心的是非善恶；以圣神的德能作盾牌，去抵制恶人的阴谋暴力，另外盾牌与宝剑，也体现出了耶稣会的军事化组织的特色。校徽衬底的棕树枝，是古希腊和罗马人用来迎接凯归的战士额常青树枝，代表成功与常胜。<sup>21</sup>盾牌的周围则是耶稣基督的话“Labora sicut bonus miles Christi”（拉丁文），意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后二：3）<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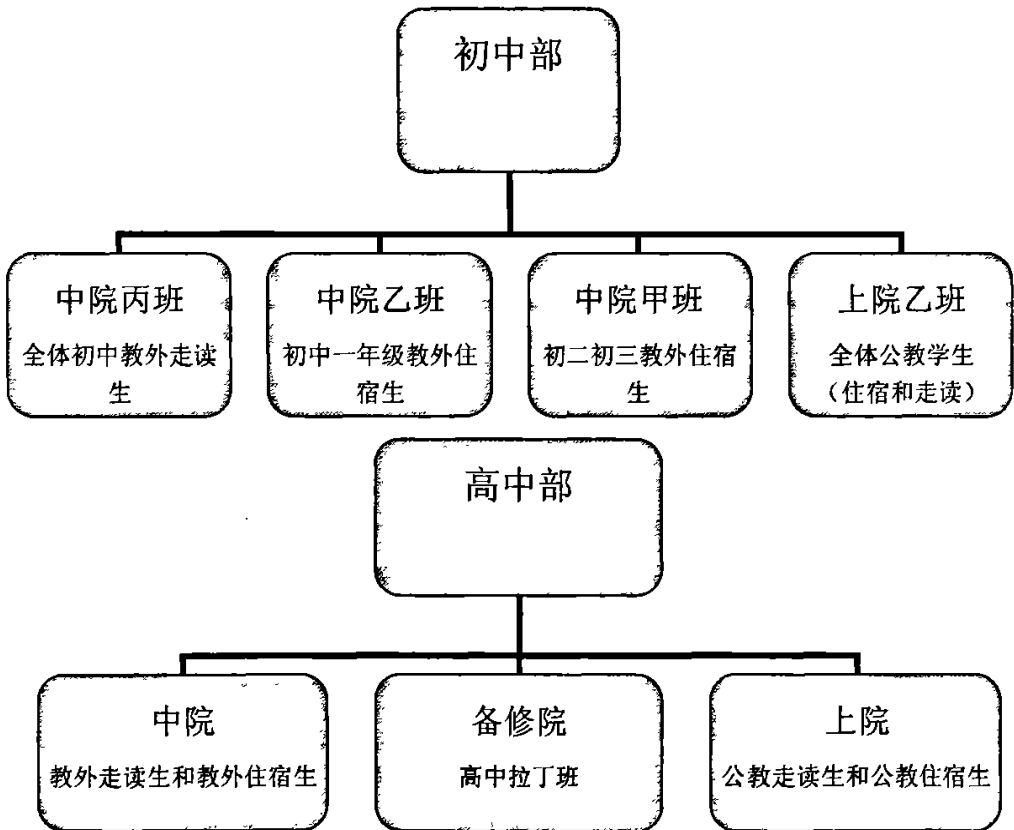
## 2、别具一格的公学制度

徐汇中学是由耶稣会士所创办，自然要以耶稣会的《教育章程》为准绳，而且多年主持校务的大多是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神父，因此，徐汇中学的学校内部组织及管理方法再经过多年的完善成熟之后，逐步从中国式的私塾传统转变成为具有耶稣会风格之外，也带有很浓的法、意两国教育制度色彩的学校体制。<sup>23</sup>

徐汇中学的校务行政管理上，立案之前，学校为耶稣会教士管理，最高行政职务是耶稣会任命的“院长”，其下由教士担任监学，负责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秩序。立案之后，学校组织了校董会，设立“校长”综理全校行政，下设教导处及总务处，各有主任一人，处内分为若干股，设专员负责，学校定期召开校务会议、教导会议、总务会议等，处理行政管理事宜。此外，学校还设立招生、考试、经济核查等专门的委员会。在教学管理方面，有级主任负责处理年级学生的事务，科主任负责主持各科的教材选择、计划安排、教学研究和考核等。各院还设有院主任，主要负责训育（三民主义教育）工作与组织课外活动等。<sup>24</sup>在经济上，早期的徐汇公学主要依靠的是教会的支持和教友的捐款，采取的是义务教

学的原则。后来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有钱人的弟子慕名而来，学校开始收取学费。在 1914 年的学校章程中，规定缴费标准是，教外生每人 120 元，校友亲属兄弟可减去 10 元，教内学生则是 40 元，另有加餐费每人 100 元，可由个人自愿缴纳。校董会组建之后，便成立并管理校基金会，负责管理学校基金，维持学校的经费收支平衡。<sup>25</sup>

其他的普通中学一般来说只有级的编制，而徐汇中学除了级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组织，这就是分院制度，亦即当时的一种法国公学制度。1904 年开学后，徐汇中学学生人数大增，考虑到一方面年长的学生和年幼的学生行为习惯不同，管理上也当分开，另一方面教内学生平日需要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与教外学生混杂在一处也不方便。因此，除了按照年龄大小来分的甲、乙班之外，还把教内学生和教外学生分成了上院和中院，到了 1933 年，徐汇中学开始招收走读生，于是又新成立了两个班级，教内的走读生是上院丙班，教外的是中院丙班。1934 年，徐汇中学增设了备修院，又名拉丁院，是专为有志于修道的高中生而添设的，备修院成立十年之后，高中部和初中部又各自分开，以使得高中学生获得了部分的自治机会，后来上院丙班并入了上院乙班。形成了徐汇中学特有的管理体制。（如下图所示）每个院都有自己单独的自修教室，饭厅，卧室和操场，平时的学习生活有训导主任（亦称总监学）负责进行管理。<sup>26</sup>



在课程安排上，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徐汇中学课程表上可以看到，初中和高中的文化课程主要有：国文，英文，法文，算术，圣经，化学，物理和地理<sup>27</sup>。进入徐汇中学或年级升级，都是要经过考试的，早期的徐汇中学只要求“初等小学毕业，国文算术基础，历史地理理科略知”<sup>28</sup>，对于教内学生，还须“能背诵，六样经即早晚课弥撒规程，周主日祷文玫瑰经苦经问答，了解寻常问答以及上经言”<sup>29</sup>。而后来要求愈加严格，初一入学者须考国文和算术，初二入学者加试英文，初三入学者则要考国文、代数、几何和物理，而要想进入高一，则必须通过国文、英语、代数、几何、物理和化学这六门课的考试。每学年分为两个学期，每年五月十五或十六，以及阳历九月一日开课。每年的年假是阴历元旦前八日，暑假从阳历七月一日开始，但凡遇中国节庆日，教会大礼日，正月初一等，亦停课。<sup>30</sup>

徐汇中学学生的考试及成绩统计按学期计算，每学期的成绩统计采用十分制，一个学期共有十六学周，分为四个学月，每个学月的成绩分别占 0.5 分，另外两次临考的成绩分别占 2 分，学期考试成绩则占 4 分，并规定，其中主要科目三科不及格者或者有一科列入劣等者留级。每周每个学生主要学科的课题习作和背诵，讲解等均有成绩记录，作为星期积分，积满一个月后，合并为学月积分，每月均统计总分，均分并计算名次，进行公布。徐汇中学执行的是星期临时考试与学期考试相结合的考试制度，每周都要考一项主要科目或两项次要科目，每一学期将各项科目分为两个循环，自开课后的第一周始至学期末前两周止，每项科目都要经过两次考试，每一循环完毕，则收集各科成绩，统计其总分、均分、名次并公布之。除了以上的笔试，徐汇中学一个学期还有两次口试，一次口试安排在两次临考之间，另一次则在学期结束时与笔试同时举行，口试的科目，高中有国文、英文、法文、数、理五科，初中则只需要考国文、英文和法文就可以了，口试成绩是与同时期的笔试成绩合而为一计算的。<sup>31</sup>虽然学校的考试繁多，但是每项科目考试时间安排等，都事先在校历上做好了规定，轻易不更改，这样一来，学生也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各科的考试。<sup>32</sup>

徐汇中学的学生在校期间，不但有文化课的成绩，还有一个具有耶稣会特色的“功课单”。功课单，就是有关学生品行的“星期积分”，在欧洲的耶稣会学校，也有类似的被称之为“生命册”（Livre de Vie）。功课单一般分为三个项目，各以二十分法计算。第一项评卧室、游息、膳堂以及一切应守之规则，第二项评自修教室内的用心和秩序等，第三项评教室内的用心和秩序等，如果是教内学生，那么还需要加评第四项神业状况等。功课单每周最高十八分，得十二分及格，住宿生不及格的，星期假日则被禁止出校，如只得了八分，要记小过一次，得六分者，则要记大过一次，是一项十分严格的纪律考评制度。<sup>33</sup>

徐汇中学的自修制度也是很有特色的。高中部共有五间自修教室，每间可容纳三十人，平日自修，除了课题习作之外，并无他人监督。而初中部则是各院均有一间可容百人以上的大自修教室，自修时间有监学先生在一旁监督，负责训斥纠正不用功读书和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学生行动说话前，都要先举手，请得允许。看课外书与做劳作也有规定的时间，而且所看的书即必须经过监学先生的检查核准。小学部的自修教室是最为严格的，凡事都要问监学先生的准许，写大字、读文章、抄笔记也都有严格的时间安排和规定，目的则是要训练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纪律意识和循规蹈矩。每日在自修教室，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课题习作。课题习作是介于课外习练和考试之间的一种文化课考核方式，也要被累计成月积分的。课题习作时，学生可以翻阅可以参考书。一般来说，每日教室内的课堂讲解时间是5个小时，另有一个半小时的习作时间，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卷。除了作文是提前提在当日国文科上命题之外，还有算术、物理、化学和英文等习题，因此习作时间一开始，自修教室内的空气就非常紧张，大家都埋头做题。自修时间结束后，就是一天中最长时间的课外运动了。34

在徐汇中学的住宿生中还有一句口号，那就是“卧室神圣”。学生的卧室是名副其实的“卧室”，因为那里除了卧——睡觉——以外决不做其他的用途。卧室的门，早上学生起身后就被锁起来，一直要到晚上临睡之前五分钟才开放。白天除了万不得已的原因外，学生不得进入卧室。学生卧室都是大间，每间有一百到两百只床位不等。高中部在学生数特别多时，也会有另设的小间。卧室内，每个学生有一张床，床前放一只面盘架，下层放牙刷，漱口杯等，箱子放在床下，衣物挂在床上，书本放在自修教室的箱子里，无需带回卧室。卧室内是要严守静默，若不得已要和同学谈话，也要先征得舍监的许可后方能轻轻耳语几句，卧室的规则是高中部与初中部一样严格的。此外，对于在食堂里吃饭，学校也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首先吃饭时的座位是监学指派固定的，学生不能擅自更改。在吃饭时，必须戒除一切不规则之举动，比如“横肱侧座，放饭留饮，刺齿作声”等等，除了规定的日期可以谈话外，平时只许静默，而由轮值生讲诵圣贤传记或其他监学指定的书籍。吃饭时必须先吃素菜，后吃荤菜，食堂是不允许自带食品的，自己带到学校的食品，也必须经过校长检查，确认无害后才可“分给食之”。35

对于住宿生来说，徐汇中学的出校规则也是非常繁琐的。住宿生请假出校，一般分三种情况，一是由家长亲自来接，二是凭家长盖章的信件来领，三是学生独自出校，但家长要在续学报名单上相应的地方盖章，回校之后上交，存于校中。住宿生入校之后，若要出校，无论是否假日，都必须持有出校证，否则要受到处分。出校证的颜色，各院是分不同种类的，出校证分为两联出校证和三联出校证，两联出校证是由家长来领学生时使用的，它分为请假证（留学校训教处）和出校

证（交出门门房），三联出校证是供独自回家的学生使用的，除了请假证和出校证之外，还有一联报道证，学生到家之后，必需要家长在到家证上盖章，回校后，还要交给训育主任审核。如假日早上，有家长备函来领学生，到校后，先要将家长盖印信交给门房，再送到书记室检查印鉴，及该生本星期功课单是否及格，核对无误后，则按院次填写出校证，送教导处盖章，再送该院训育处，训育处主任撕下第一联，第二联给学生，学生拿第二联到教导处盖章，交给门房方可出校。此外，学校还有临时出校证，主要是给外地学生星期日偶然出校使用的。但凡星期日，回校的时间都是下午五点自修开始的时候，到时监学会检查到家证，并依据请假证点名，逾期不归，迟到或者补行请假的学生，都要交给教导主任，由教导处处理。36

徐汇中学的管理严格，不仅仅体现在各项制度上，更体现在日常的事务管理之中。比如学生的日常信札往来都需要经过教导处检查的。据1910年的《教育什志》披露，徐汇中学就发生过因外籍教士体罚学生而导致的学生集体退学风波。据记载，当时，学校当中的外籍教士对学生十分严酷，“稍不当意，辄拳足交施，习固为然”。其后，一个新调来的外籍教士对学生管理更加严酷，学生在与之不和的某教员的暗中鼓动下，“联合一会以抵抗之”，“学生自立会后，遇教士虐待，则群起哗噪，不如往昔之驯伏”。某日，“教士殴学生，学生竟敢还殴”，于是教士怒不可遏，遂调集巡捕和取来徐家汇防兵营中的竹板皮鞭，对学生施以笞刑，导致“学生次第受刑者四十余人，至于流血，全体大愤，一哄散学”。教士命令防兵把守徐汇新桥，勒令学生回校，而学生则坚持全体罢课。双方相持数日之后，借口年假放学，准许学生纷纷回家，这次风波才算告一段落。这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也是很少见的。37

### 3、学生生活与校园文化

徐汇中学在上海以校规严紧而著称，学生的每日生活学习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并且一切活动都有监学随时随地进行监察。

住宿生每天早上大约六点二十分就被铃声叫起，起床之后，漱洗已毕，就到操场上去做早操，早操之后则先去自修教室自修，等待早饭开饭。到了七点三十五分，大家去吃早饭，随后有片刻时间可以游玩休息，然后继续自修。到了上午九点钟，是正式开始上课的时间了，上午一共有三节课，每节课要上五十分钟，课间只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到了正午，吃完午饭，学生可以休息到一点钟就要开始自修了。从一点五十分开始，和上午一样上三节课，课毕，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在自修片刻，到了六点钟就可以吃晚饭了。晚饭之后是课后练习时间，然后自修，直到八点四十五分才可回卧室睡觉。一般每周三下午只上两节课而会增

加一个小时的锻炼休息时间。每周一上午前两节课，则是临时考的时间。38住宿生的平时生活是勤俭朴素的，每人的日常装束都是长袍，西装革履反而会显得格格不入。每日的饮食，在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一般学生都是两粥一饭，菜肴虽然普通但是也不失营养，当然，学校里面也没有可以购买零食的地方。不过，从徐汇中学章程中我们亦可了解到，教内学生，如果需要加餐的话，入学之时是要多缴纳一百元“加餐费”的。

相比之下，走读生的生活就比较宽松和自由了。走读生，也被称为“通学生”，徐汇公学原来是只招收住宿生的，1933年立案更名之后，徐汇中学则开始同时招收走读生了。走读生每日七点半到校，可以先到操场上运动，八点十五分，自修钟打过之后，则和住宿生一起整队进入各自的自修教室自修，预备上课的资料。上午上完课后，中午回家吃饭。到了下午一点钟，大家又都陆续返回学校，走读生的下午自修时间是一点半开始的。下午课毕，可以散心片刻，从四点四十分起自修做练习，期间不准讲话，做好功课的，可以出去看足球比赛或者进行体育锻炼。五点四十分是放学的时间，走读生便可回家去享受自由的生活了。39

除了教外的学生，徐汇中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公教学生。公教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看上去与教外学生并无太大的差别，不过多了很多宗教的活动，要求也更为严格。教内的学生是五点二十分就要起床的，五点三刻就要到自修教室，因为六点半开始就是每日早晨的弥撒时间了，徐汇中学内，是有小教堂专供教内学生平时使用的。他们平时有必修的“圣学课”；每日工作和自修开始的时候，以及三餐前后，都要祈求和感谢天主，同时还有人朗读“圣书”；午饭过后，要公拜圣体，并念玫瑰经，晚饭之后，还有圣经讲解，睡觉之前，也有晚课经要念。到了周日，早饭后，还要拜苦路和读问答，晚饭之前也有降福。每逢主日和圣母月，还有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的举行。40

1934年秋，在上海教区成立了“备修院”，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为即将进入修院学习的神学生所开设的预备班学院。第一届共有37名高中生，首任理院是一位松神父（R. P. Savio），备修院就设在当时大修院的旧屋内，也被学生们称为拉丁院。到了1939年时的理院舒神父（R. P. Durand）才要求大家正式称之为“备修院”，并发起“默想运动”，也就是提前十分钟起床，在弥撒之前加一个短默想，以表警醒自重。起初，备修院作为徐汇中学的一部分，院内的生活也类似于徐汇中学的其他学生，只不过在出校方面受到限制，除了例假日之外，只有每月第一星期日可以外出。1942年秋，因为上海教区修士人数不足，也为了使备修生们“更深切地认识修士生活的神圣，圣招目标的高尚，传教事业的伟大，救灵工作的重要，并得到更为完善的训练，更丰腴的营养”41故而将备修院从徐汇中学迁至教区主教府的小修院内，此后，备修生的生活就开始依照修士们的惯例了。早



上有默想，午前行省察，晚上听道理，到了主日，早上还有周省察，每日还必须谒见神甫诉谈，除了月试放假之外，其他时间概不得出院，所谓“生活修士化”，不过在学习上仍然是作为徐汇中学的高中学生的。<sup>42</sup>

耶稣会的中学教育在欧洲被称为人文中学的教育。这种人文中学教育的内涵除了课程的设置上之外，还有与严格的管理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在欧洲，耶稣会中学就以学生自治、戏剧表演以及形式多样的宗教活动而闻名。这些耶稣会中学的特色，在徐汇中学的日常教学活动中，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欧洲的耶稣会学校中，由学生担任“级长”和“班组长”，通过定期评比和奖励优秀来鼓励学生之间的相互监督，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监督来达到帮助学生防范于未然，避免更大错误的目的。<sup>43</sup>徐汇中学的每个院内都设有学生自治组织，或以队为单位，或成立学生自治会，每院分为若干队，设立队长负责制。每周进行一次考评，并且进行排名公布。如果全队学生在一周之内用心读书，勤守规则的，监学修士则予以表扬嘉奖；如果有人违规犯过，那么则要全队记过一次。通过这样的形式，逐渐实现了从监学用强制手段禁止违规，到监学监督下的同学之间相互督促，到学生积极主动服务教学，维持秩序的转变，实现了学生自治。

同时，欧洲的耶稣会学校还十分盛行戏剧表演，戏剧一般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以宗教道德题材或圣经故事为主，一方面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让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培养自信心和锻炼言说的能力。徐汇中学的戏剧表演也是非常盛行的。1923年12月的圣母献耶稣于主堂占礼上，学生上台演剧，扮演“圣母献耶稣于主堂事迹”<sup>44</sup>。1933年5月，徐汇中学圣体军成立十周年纪念年活动中学生上演了四幕剧《找到了母亲》<sup>45</sup>，随后在徐汇中学庆祝院长华诞的活动中，学生又上演了游艺表演《朋友之间》<sup>46</sup>。1940年12月的圣方济格沙勿略占礼上，学生又上演了话剧《万里寻弟》<sup>47</sup>。其中很多高年级学生表演的话剧都是使用法文和英文的，亦可见徐汇中学的外语教学水平之高。当时，徐汇中学的话剧组也在上海颇有名气，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也被传播。

此外，徐汇中学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课外娱乐活动。高年级学生，每逢较长的假期，可以在神父的带领下外出旅行。中学的学生还积极创办壁报和班刊，如高中1933级学生创办了《卅三半月刊》，内容含文艺、学术、教理、音乐、校讯等，供大家联络感情，联系写作和增进学识；1942级的初一学生也不甘落后，在国文教师顾修士的支持下，创办壁报《蓓蕾半月刊》，而同时的初二初三学生也有自己的壁报——《文流月刊》<sup>48</sup>。除了这些手抄的壁报和班刊之外，还有1934年由圣母会创立出版的《光启》杂志，以及官方出版的《汇学杂志》，其中《汇学》杂志还按照法文版和中文版分为甲乙两种刊印。在每周一考试之后，徐

汇中学还有同学自行组织的音乐会用来恢复精神，所用的乐器有胡琴、洋琴、口琴和箫，其中以口琴为多，偶尔还有同学进行梵哑铃的演奏，展现了中学音乐教育的成果和学生们的多才多艺。在抗战期间，由于灯火管制，学校晚间的自修一度不能正常进行，于是上院乙班的全体公教学生便在修士的倡导和支持下成立了演讲会，晚饭时间，大家轮流上台演讲，讲完之后还有评议，演讲的题目题材由学生自选，修士审定，涉及广泛，有“怀疑”、“中学生应有之精神”、“一个人怎样在社会上立足”、“勤”、“人格”、“饮食”、“读书的方法”、“绰号”、“娱乐”、“死亡”等，这些演讲开拓了大家的眼界，锻炼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同学的口才<sup>49</sup>。另外，说到徐汇中学，当时闻名沪上，除了教学管理严格，法文水平高之外，还有一项耶稣会士所引进的重要体育活动，那就是足球运动；历来耶稣会士就十分重视足球运动，徐汇球队很早就在上海负有盛名，以及1930年成立的“旋迴”队，曾多次在上海市内、教会学校之间的足球比赛中获得冠军和亚军，1940年，徐汇校队还获得了“震旦杯”冠军。徐汇中学内，足球是大部分学生都积极参与的主要课外运动项目，每逢足球比赛，也有很多学生前去观战。50校内的体育活动，此外还有篮球和网球等，也很流行。

其实，耶稣会中学的宗教课程并不多，在1933年的高中课表上，圣经类的宗教课程只占不到一周课程的十分之一。立案之后，更是依照政府的要求，将宗教与教学活动相分离。不过徐汇中学向来是将宗教教育融入到了整个的教学活动体系之中的，通过潜移默化，春风化雨般的方式来影响学生。学校每逢宗教纪念日，均要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内容有足球比赛、游艺会、歌唱、音乐会、小游戏、话剧表演和演讲会等，还会举行弥撒，校内学生均参与其中，热闹非凡。此外，在院长本名庆日、主保庆日，以及圣母会，圣体军成立纪念日，还有亡故校友校内教士的追思大会上，均会举行弥撒。在抗战期间，校内的公教学生还发起了一次“传教储蓄运动”，成立“公教传教储蓄会”，募集资金，补助传教经费，援助贫困学生，帮助公教事业的发展。

圣母会是耶稣会所特有的组织。对圣母玛丽亚的顶礼膜拜，是耶稣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耶稣会接受的是“圣母无玷始胎原罪”的学说，并且力求使这种信仰感官化和内在化。1563年，第一个圣母会在耶稣会的罗马学院里成立，随后这种立足于知识阶层和学校里的宗教平信徒团体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853年，徐汇公学按照耶稣会创立公学的范例，在教徒学生中发起圣母会，奉无原罪始胎圣母为主保。当年10月，共有16人报名并被录取，成为上海天主教徒中首批圣母会会友，随后选举了领袖。不过在圣母会中，实际领导人为值会司铎，领袖只是充当联络人的角色。当年12月，领到耶稣会总会长的文凭，徐汇公学的圣母会得到了罗马的承认，成为了正式的圣母会。51圣母会的首任值会司铎就是徐汇公

学的首任校长晁德莅 (Angelo Zottoli)。到了 1923 年，徐汇中学圣母会的值会司铎，奉命更替者前后已有二十位，共计收录会员八百余名，其中除了修士之外，更有前清生员四十余人。1923 年 12 月 9 日，圣母始胎占礼，恰逢徐汇校友会三周年大会，当时教内外来函道贺者甚多，其中更有当时的罗马宗座驻中国代表和罗马圣母会宗会的贺信贺书。<sup>52</sup>

1920 年，徐汇公学校友会成立，当时的徐汇公学校友会也是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组织，在校友会的简章中，除了一些常规的职责义务的规定之外，还有关于宗教活动的多处规定，例如校友会简章第八条就规定：“每月头主日可得母校学生加行神业代祷之工。且遇神行急要，得随时函请母校代为祈祷，并为通知类思小学，大小修院，圣衣院，圣母院等一体祈求；会员亡故，可由家族函告本会，俾代献弥撒两台，并公致吊唁；每年开大会时，专献弥撒一台，为已亡故众校友。”<sup>53</sup>在 1923 年的徐汇中学校内宗教纪念活动中，还有八十余名校友会会员参加了学校内的一些宗教活动。<sup>54</sup>

通过这些形式多样的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天主教在校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学校内形成了浓厚的宗教文化和氛围，对于教外的学生而言，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了解天主教乃至加入天主教。

## 4、设施规模与学校发展

徐汇公学创立之初，仅有茅草屋数间，学生教员不足百人，其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多次扩建校舍，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徐汇中学在当时上海的中学之中，已经堪称是规模宏大了。

据当时记载，走进徐汇中学的校门，两边便是榆树迎立，校内有柏油马路，路边是浅草丛，花坛和树木，春夏树木成荫，秋日黄花吐艳，冬季银装素裹，早晨晓风拂袖，晚间月上栏杆，校园风景可谓四季咸宜，使人别起会心，精神大爽，读书兴味，也随之增进。<sup>55</sup>

当然校园里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四幢校舍了。徐汇中学的校舍分为新校舍，旧校舍，西校舍和南校舍四座。旧校舍建于 1878 年，原为三层大厦，后来加高一层，旧校舍的底层一部分是初中教室，其他就是高中部的所在了，二楼主要用作高中部主任办公室，阅报自修室和教室，三四层为卧室，校医诊治室和病生休养室等。西校舍和南校舍也是经过改造和扩建的，其中西校舍为两层建筑，外形与旧校舍相仿，上层东部为教员宿舍，西部与下层则为初中生教室和通学生（走读生）自修室；南校舍别具风格，先为下院和备修院所在，后备修院迁出，则该做光启社（上海教区的文化机构）办公之用；西校舍边有一排小屋，则是庶务处，澡堂和厨房等。新校舍是 1918 年建成的，为四层大楼，建筑坚固，外表

壮观。下两层为学校行政机关，校长办公室，书记室，大礼堂，理化实验室，生物标本陈列室，校图书馆等皆设于此，此外还有初中生的自修教室和食堂，三四层则使音乐室和初中生的卧室。56

徐汇中学以足球等体育活动而著名，其操场的规模也不小，校内共有三个操场，一个大操场，可以作为大足球比赛之用，平时以木栅栏分为三区，可供三院学生同时运动之用，另两个小操场，再加上北校门外的小操场，虽然面积较小，但是也足以供一个院学生的体育活动了。

徐汇中学的图书馆规模也不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徐汇中学只有各院的图书室，并无全校的公共图书馆。各院在教员宿舍办公处设立图书室，以便于教员参考查阅资料，图书以国学参考书为主。后来修士们又增设了修士图书参考室，除了经史古籍外，增加了很多西文书籍。1934年，中学将教员宿舍办公处图书室内的图书以及修士参考图书室内的中文书籍集中起来，成立了校图书馆。1935年，又将所有的中文图书皆归于校图书馆，并且编目分类，而西文图书仍然属于修士参考图书室。到了1938年，校图书馆将所有藏书编印目录，分发到各院，并陆续添置了包括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和丛书集成等在内的五千余册新图书。到了1940年代初，校图书馆藏书室共有三间大房间的规模，每间四壁皆为高达的书架，并有阁楼式的回廊以便于取书。计有中文版书籍五、六十种，法文版书籍二、三十种，日报十余种，杂志四五十种，大概而论，以国学方面的书籍最多，其次是自然科学，再次是应用科学，共有中文书籍两万五千余册，西文书籍四千余册，宗教书籍一千五百余册。同时，各院的图书室并未取消，院内购书，大多比较实用或者切合学生的需求。中院甲班因为早年为外教生班，后来又吸纳了校内学生组织勉励社的图书，故而规模最为充实。中院乙班则多游记和小说，上院乙班多为宗教书籍，高中部于1940年另设图书室，主要图书分自上院甲班和校图书馆。校图书馆加上各院的图书室，全校总计藏书在五万册左右。57

1904年，应用科学被列入了徐汇中学的正式课程，于是学校设立了理化（实验）室。理化室初设于老校舍，物理化学仪器药品混放于一间教室之内。后来逐渐增添设备，并迁至新校舍，分为化学教室、物理教室、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拥有抽气机，静电发电机，煤气制造器，还有声、热、气、电、光、力学等多钟实验仪器，以及多种矿物标本和药品。学生每周都有一次实验课程。58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徐汇中学，继续发展壮大。1937年，抗战的战火燃烧到了上海，当时的徐汇中学就在校外操场搭建草棚供难民居住，并号召全校师生缩减伙食，支援前线将士。1940年，徐汇中学的小学部（下院）与原汇师小学合并。日寇占领上海期间，徐汇中学与当时的启明女中、徐汇女中等坚持办

学，1941 年秋，原汇师中学撤销建制并入徐汇中学。1943 年，学校大力倡办助学金，以资助清寒学生。1945 年春，日军强占部分校舍，中学初中部的学生被迫迁至慈云小学上课。半年后，日寇战败投降，徐汇中学师生热烈庆祝复校。随着教外寄宿学生数量的大量增加，徐汇中学增设了中院乙班，当时的学校编制，除了备修院和高中部外，上院分为乙丙两班，中院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中学的校舍也进行了全面的修葺翻建，外貌焕然一新。此间，耶稣会士朱洪声由美国返回上海，担任教导主任，从此，英文取代了法文，成为了徐汇中学的第一外国语。1951 年，徐汇中学被人民政府接办，1952 年 11 月改为公立学校。

## 四、耶稣会文化传教在近代上海

1850年在徐汇耶稣会所创办的那所小小的识字学堂，既可以说是耶稣会士们的无心插柳，也可以说是一种耶稣会的文化传教使命的必然结果。说是无心插柳，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学堂本是在灾年扶贫救济的一项措施，恐怕当年创办的耶稣会士们也不会想到他今后的发展壮大枝繁叶盛。

鸦片战争之后的清帝国，从开放的口岸开始，文教统治和价值体系开始逐步走向瓦解。在传统学校教育已经开始衰败的上海，加上连续的大雨和水灾，传统的地方政府应付水灾尚且应接不暇，就更不会有心情去考虑教育的问题了。耶稣会士开办学堂一方面是为了收留无家可归的儿童，另一方面也是当地缺乏学校。耶稣会在欧洲已有开办学校的传统，耶稣会在中国还有借助儒家传播天主教的经验，因此，开办学校的目的之一，或许就是要通过传授中国传统文化，一则，亲近教会与当地传统百姓们的关系，以便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二则鼓励学生中的优秀者“学而优则仕”，可为今后的“文化传教”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耶稣会士们并没有向这些小学童们教授欧洲的文化科学，而是请来当地的教书先生和进士举人，向这些小学生讲授传统的四书五经，儒家文化。这是徐汇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此时上海的教会学校，出了徐汇公学之外，还有裨文女塾与清心书院，此时的中国家长们，也对教会学堂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富庶之家，多不屑于将子女送入此类学校，学生多来自教民之家和贫苦人家。尽管免费教学，学校的招生依然十分困难，时间长了，才逐渐有所改善。

1881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立中西书院，标志着上海教会学校一个新的阶段的到来。中西书院则是着眼于培养“学贯中西”的治国和外交人才，侧重英文教授，中学西学相辅而行。此时的徐汇公学，教士们认为古老的清帝国正在走向奔溃，传统的教育方法和内容远远落后于时代，因此，法文和西方耶稣会学校的人文课程和自然科学逐步被引入了徐汇公学，渐渐超越了传统的国文教育。徐汇中学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步从一个小学堂成长为一个正规的中学。而中西书院一改以往教会学校主要从穷人家庭招收学生的传统，而是从富有家庭招生。中西书院开办时，尽管学费颇昂，申请入学的人仍然远远多于招生人数，这反映教会学校已在上海立定脚跟，为社会所认可。在这个阶段，徐汇公学的历史悠久，重视德育，管理严格等特点，使得当地“为父母的，很安心，很愿意，送儿子到该校读书”<sup>59</sup>，另一方面，上海开埠，外文人才是市场所紧缺的资源，徐汇公学以其高质量的外文教学，自然也能够吸引众多家庭的目光。不过，随着英美公共租界的设立，以及英语在上海洋场中的逐渐普及，徐汇中学也不得不于1904年增设英文课程，供学生选修，等到抗战胜利后，法国势力基本退出上海

之后，在美国归来的耶稣会士的主持下，英文取代法文成为学校的第一外国语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对于二十世纪初的教会中学来说，收回教育权运动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教会中学，在传授各种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必然会把传播宗教和发展教徒作为一个重要的目的。即使是在章程中明确了“信仰自由”的徐汇中学，也通过各种方式在学校中努力营造浓郁的宗教氛围。收回教育权运动爆发之后，“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成为那个时期教会学校的统一的调整口号。教会学校开始主动向政府立案，由中国人出任校长，同时，更加区分教内和教外的学生，灵活设置和改善宗教课程与活动，以适应政府的要求。如此，世俗教育也逐渐在教会中学中占据越来越主要的地位。1892年，圣约翰书院开始正规的大学课程，首开上海大学教育的先河。徐汇公学并没有像很多教会中学那样发展成为教会大学，但是在徐汇公学读书成长并曾经担任过校长职务的马相伯先生于1902年创办了震旦大学。在此后徐汇公学的章程中，就明确写道“本校中学兼为震旦大学预科，故毕业后升入震旦大学正科肄业。”故而，震旦大学，也可以看作是某种意义上徐汇公学的延续和继续发展。

从徐汇中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与利玛窦那一代的耶稣会士相比，新一代的耶稣会士虽然继续贯彻着人文主义的传统和“文化传教”的策略，然而时过境迁，庞大的清帝国已经开始逐渐失去了天朝上国的气势，而耶稣会士是搭乘法国胜利者的军舰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此时这般的心情已经与往日大大不同了。利玛窦那一代耶稣会士眼中强大的中华帝国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新一代耶稣会士留下的文字记载中，已经逐渐变得野蛮、落后和动荡。政府是守旧和愚昧的，百姓是贫穷和无知的。渐渐地，他们认为唯有在法国保教权和炮舰支持下的恫吓才是消除障碍、开拓传教事业的最便捷途径。利玛窦等人当年在传教的过程中极力地避免与中西方政治纠纷相牵连，而新一代的耶稣会士们却一直津津乐道于他们与法国驻沪的军队和外交使节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或许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主导下，耶稣会最终放弃了重返北京恢复与帝国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上层交流并从整体上影响帝国文化的计划，而是以上海为中心，开拓出了蓬勃发展的地方性文化事业。与利玛窦那一代耶稣会士尊重抑或推崇中国儒家文化所不同的是，新一代耶稣会士在文化教育事业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中学和西学的态度确是迥然不同的。新一代的耶稣会士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如利玛窦等人那样对于中文和儒家经典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掌握，有些人甚至蔑视中国文化，粗暴地低毁儒学。而他们的教育，逐渐被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所主导，他们的传教，已带来更多的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拯救”意味。耶稣会士试图将宗教的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教育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然而我们发现，他们在人文主义的形

式下却无法真正深入到中西文化互动的内涵之中，在地方文化事业上做出辉煌成就的耶稣会，却再也没有与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之间的良性互动，耶稣会中学培养出来的更多的是在上海洋场上工商业界从事工作的职员，而耶稣会却同时失去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风起云涌的中华帝国中崭露头角的机会。



## 附录：徐汇中学大事年表（至 1953 年）

- 1849 年 5、6 月 徐家汇天主堂 院长 晁德莅司铎 收容难民，并施教育，乃拨茅屋数间，权且充作学舍，是徐汇中学的胚胎
- 1850 年 生源增加，正式立学，取名徐汇公学，奉圣依纳爵为主保，称依纳爵公学。7 月 31 日 圣依纳爵堂祝圣升堂 为学校学生祈祷之所
- 1852 年 创立圣母会 耶稣会总会长之文凭颁到
- 1853 年 3 月 在太平军的侵扰下 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
- 1854 年 7 月 17 日 举行考试 得到上海当局的关注
- 1859 年 学生增加 扩充校舍
- 1860 年 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多有考取
- 1862 年 耶稣会初学院设立 本校学生入会修道者 十一名 有马相伯等人
- 1878 年 学生激增 扩建校舍
- 1889 年 蒋邑虚任校长 当局颇为重视
- 1900 年 改原来的国文为主的课程 法文及其他科学也成为必修  
每届 6 月 21 日 为占礼日 举行灯会烟火 校友会初具雏形
- 1904 年 课程改革 英法文选修 对于教外学生 秉承信仰自由原则  
2 月 分设上中院 教外学生为中院生 教内学生为上院生  
上院生 宗教礼仪 中院生 组织讲学社 后发展为规勉社
- 1905 年 开辟操场 提倡运动
- 1911 年 辛亥革命 改学制为 高小（3 年）+ 中学（3 年）  
西文以法文为主，兼习英文
- 1914 年 中学第一届毕业
- 1915 年 扩建校舍
- 1918 年 6 月 20 日 新校舍建成
- 1920 年 立校七十周年庆典 马相伯南下 徐世昌赠匾 校友会正式成立
- 1921 年 6 月 26 日 校友会第一次常年大会
- 1923 年 12 月 9 日 圣母会七十周年大庆
- 1927 年 3 月 13 日 朱闻轶 主教 于罗马祝圣归来 回到母校 举行庆典
- 1928 年 5 月 6 日 蔡元培 于右任等及校友会 共庆马相伯晋九之期
- 1931 年 组建校董会 6 月 12 日 当局教育部门准予设立 8 月 4 日 准予立案  
1932 年 改为三三制中学 徐汇中学 私立中学 依法备案 4 月 23 日 教育局批准备案
- 1933 年 教育局准予立案 并报教育部备案

1934年 增设 备修院（拉丁院）选修拉丁文 毕业后学生进入修道院  
1937年 8月 收容难民 凭借是天主教会设立的学校 抵制日伪统制教育  
1940年 秋 开学 划分初中、高中部 设立高中一院  
小学部与汇师小学合并  
建校九十周年大庆 马相伯寄语“英俊满堂”  
1942年 3月 日军进占徐家汇 学校坚持立场 为教育界留一份正气  
1943年 春 院长庆日 筹措资金 设立助学金 奖学金  
12月 圣母会九十周年纪念  
1944年 4月 庆祝蒋赠梅先生七十大庆  
1945年 4月 日军强占校园  
1945年 日寇投降 光荣复校  
1946年 春季开学 重新调整课程 以英文为主科，法文为选科  
恢复因战时环境所不许而暂缺的科目  
1951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徐汇中学  
1953年 改为上海市徐汇中学，市立中学，开始招收女生

## 注释

- <sup>1</sup> 徐汇纪略 [M]. 上海: 土山湾印书馆, 1933
- <sup>2</sup> 李天纲. 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192~197
- <sup>3</sup> 周太玄. 法国教育概览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29: 10 “法国中级教育依性别分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两种, 中又因经济上来源及组织上之不同, 又分为国立中学 Lycee 和公立中学 College”。又见于盛宣怀《愚斋存稿》卷 2, 第 20 页: “环球各国学校如林。大率形上形下道与艺兼。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 专教出使、政治、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皆可兼学商务。经世大端, 博通兼综。学堂系士绅所设, 然外部为其教习, 国家于是取才。臣今设立南洋公学, 窃取国政之义, 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 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商捐经费, 学资不出于一方, 土籍不拘于一省。……其学生毕业给凭, 与国家大学堂学生身分无异。”
- <sup>4</sup> 胡玲. 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 [A]. 见: 世界宗教文化 [J]. 2004, 02: 9-10
- <sup>5</sup> 胡玲. 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 [A]. 见: 世界宗教文化 [J]. 2004, 02: 11
- <sup>6</sup> 胡玲. 罗耀拉与耶稣会教育 [A]. 见: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 2002, 05: 679
- <sup>7</sup> Durkheim. Emile (涂尔干. A.). 教育思想的演进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73-275
- <sup>8</sup> Durkheim. Emile (涂尔干. A.). 教育思想的演进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334-335
- <sup>9</sup> 肖朗. 近代西方教育导入中国之探源——艾儒略与明末西方教育的导入 [A]. 见: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J]. 1999, 01: 24-25
- <sup>10</sup> 马镛. 外力冲击与上海教育 [M]. 湖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41
- <sup>11</sup> Pfister. Aloys (费赖之). 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8: 42
- <sup>12</sup> 史式微(法).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35-42
- <sup>13</sup> 孟庆. 消逝的土山湾 [A]. 见: 中国宗教 [J]. 2003: 40-41
- <sup>14</sup> 徐汇纪略 [M]. 上海: 土山湾印书馆, 1933
- <sup>15</sup> 史式微(法). 江南传教史(第一卷)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170
- <sup>16</sup> 徐汇公学章程.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号 72-1-80, 1914: 1
- <sup>17</sup> 史式微(法).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289~290
- <sup>18</sup> 史式微(法).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289~290
- <sup>19</sup> 徐汇公学章程.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号 72-1-80, 1914: 1

- 
- <sup>20</sup> 新旧约全书 [M]. 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1989 年, <新约>: 250
- <sup>21</sup> 徐汇中学圣母始胎会友 80 周年庆纪念册 (2)》第 45~46 页 上海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21
- <sup>22</sup> 新旧约全书 [M]. 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1989 年, <新约>: 242
- <sup>23</sup>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7~8
- <sup>24</sup> 上海市中等教育概况. 上海: 上海市教育局, 1948, 上海市图书馆
- <sup>25</sup> 徐汇中学申请立案表. 上海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76, 1932
- <sup>26</sup>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7~8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5~6
- <sup>27</sup> 私立徐汇中学课程安排.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21, 1944: 1、2、10、12、15
- <sup>28</sup> 徐汇公学简章.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79: 3
- <sup>29</sup> 徐汇公学章程.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80, 1914: 2
- <sup>30</sup> 徐汇校闻.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5, 1947: 19
- <sup>31</sup>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6
- <sup>32</sup> 徐汇校闻.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5, 1947: 18
- <sup>33</sup>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7
- <sup>34</sup>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9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80
- <sup>35</sup>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10
- <sup>36</sup>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8
- <sup>37</sup> 李楚材.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131~132
- <sup>38</sup>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41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40  
徐汇校闻.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5, 1947: 18
- <sup>39</sup>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42  
徐汇中学学生毕业成绩展览纪念册.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6, 1942: 18
- <sup>40</sup>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40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39  
徐汇中学学生毕业成绩展览纪念册.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6, 1942: 16~17
- <sup>41</sup> 上海徐汇中学卅一年度学业成绩展览会纪念册. 上海图书馆, 1942
- <sup>42</sup> 徐汇中学学生毕业成绩展览纪念册.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6, 1942: 17

- 
- <sup>43</sup>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60~65
- <sup>44</sup> 徐汇中学校友会.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91, 1923: 61~62
- <sup>45</sup> 私立徐汇中学课程安排.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21, 1944: 9
- <sup>46</sup> 徐汇中学学生毕业成绩展览纪念册.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6, 1942: 24
- <sup>47</sup>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45~46
- <sup>48</sup> 徐汇中学学生毕业成绩展览纪念册.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6, 1942: 20
- <sup>49</sup>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40~48, 77
- <sup>50</sup> 徐汇中小学校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4, 1946: 46~47
-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44
- 徐汇校闻.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5, 1947: 10
- 徐汇中学学生毕业成绩展览纪念册.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6, 1942: 27~30
- <sup>51</sup> 徐汇中学校友会.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91, 1923: 63~64
- <sup>52</sup> 徐汇中学圣母始胎会友 80 周年庆纪念册 (1).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21: 1, 25
- 徐汇中学圣母始胎会友 80 周年庆纪念册 (3).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21: 21~31
- <sup>53</sup> 徐汇公学校友会报告. 上海图书馆, 1923
- <sup>54</sup> 徐汇中学校友会.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90, 1922: 1~4
- <sup>55</sup>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15
- <sup>56</sup>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16
- 徐汇中学学生毕业成绩展览纪念册.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6, 1942: 7
- <sup>57</sup>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17~18, 25
- 徐汇中学学生毕业成绩展览纪念册.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6, 1942: 8
- <sup>58</sup>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 18
- 徐汇中学学生毕业成绩展览纪念册.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 档案编号 72-1-16, 1942: 10~14
- <sup>59</sup> 李楚材.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199

## 参考文献

1. 私立徐汇中学校史.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1
2. 徐汇中小学校刊(1946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4
3. 徐汇校闻(1947—1949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5
4. 徐汇公学纪念册(1920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15
5. 徐汇中学学生毕业成绩展览纪念册(1942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16
6. 徐汇中学就是九届高中毕业纪念册(1949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17
7. 徐汇中学中院乙班恳亲会(1947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19
8. 徐汇中学九十七周年校庆恳亲纪念册(1947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20
9. 徐汇中学圣母始胎会友八十周年庆纪念册.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21
10. 上海徐汇中学胜利纪念刊.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22
11. 徐汇中学外校来函(1933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24
12. 徐汇中学函件留底(1931—1934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25
13. 上海市教育局令文(1930—1937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56~72-1-63
14. 徐汇中学概况表(1941—1953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75
15. 徐汇中学申请立案表(1932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76
16. 徐汇中学时事录.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77
17. 徐汇公学简章. 上海市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79
18. 徐汇公学章程(1914年). 上海市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80
19. 徐汇中学校友会(1922年、1923年、1924—1931年、1932—1936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90~72-1-93
20. 私立徐汇中学课程安排(1944—1945年).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档案编号 72-1-121
21. 1945—1949年徐汇中学送出的文件与函件.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22. 光启杂志, 纵横杂志, 汇学杂志, 上海: 徐汇区档案馆档案
23. 上海徐汇中学卅一年度学业成绩展览会纪念册(1942年). 上海图书馆
24. 上海市中等教育概况. 上海市教育局, 1948发行, 上海市图书馆
25. 李楚才. 帝国主义侵华史资料—教会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26.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7.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8.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29. 马镛. 外力冲击与上海教育 [M]. 湖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30. 章开沅. 中国近代教育与基督教 [M]. 湖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31. 李国钧.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六卷) [M]. 山东: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32. 张化. 上海宗教通览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33. 王炳照.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五卷 [M]. 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34. 20 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 第八册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35.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9—10 科教文卫)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6. 马相伯传记资料 (影印本) [M]. 台北: 天一出版社, 2000
37. 吴梓明. 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8. 朱维铮. 马相伯集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39. Durkheim.Emile (涂尔干. A.). 教育思想的演进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0. Hartmann Peter Claus (哈特曼. P. C.). 耶稣会简史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41. Paris. E. (帕里思). 耶稣会士秘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42. Bruce Shelley (布鲁斯. 雪莱). 基督教会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3. 李骏修, 芮达权. 徐汇区教育史略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9
44. 陈科美. 上海近代教育史 (1843~1949)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45. 张民生. 上海市学校概况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46. 史式微 (法). 江南传教史 (第一卷、第二卷)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47. 李天纲. 新耶稣会士与徐家汇文化事业 [A]. 见: 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48. Jean Paul Wiest. A Tale of Two Cities [A]. In: 吴小新, 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Chinese-Western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49. 胡玲. 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 [A]. 见: 世界宗教文化 [J]. 2004, 02
50. 胡玲. 罗耀拉与耶稣会教育 [A]. 见: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 2002, 05
51. 姚立昕. 试论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的特色 [A]. 见: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J]. 2002, 02
52. 孟庆. 消逝的土山湾 [A]. 见: 中国宗教 [J]. 2003, 06
53. 肖朗. 近代西方教育导入中国之探源——艾儒略与明末西方教育的导入 [A]. 见: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J]. 1999, 01
54. 范亚东. 略论晚明时期耶稣会对华传教政策的变迁 [A]. 见: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 [J]. 2005, 04

55. 林金水. 试论艾儒略传播基督教的策略与方法 [A]. 见: 世界宗教研究 [J]. 1995, 01



# 致 谢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一晃，我便将要度过在复旦园内的第七个年头，也将要结束自己的学生生涯。七年前，懵懵懂懂，我刚刚跨入大学，七年后，诚惶诚恐，呈上这篇至今亦并不能令自己完全满意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在此，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父母的养育之恩，使我能够二十余年安心于校园生活，享受学生时代的快乐。父母的教育、教导和支持，亦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的重要助力。

其次，要感谢我的恩师李天纲教授。正是李老师这三年多来的悉心教导，传道授业，以及用其渊博的学识在人生的各个领域给予我的指导和教诲，才使得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宗教学专业的王雷泉、张庆熊教授，以及王新生、刘平、朱晓红、程群等各位老师也从本科开始就不断地为我的成长付出心血和汗水，哲学学院的其他各位老师们也在我的求学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帮助。饮水思源，师恩难忘，我将永远铭记各位老师的教诲，踏实勤恳，走好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每一步。

再次，论文的完成，要特别感谢徐汇区文化局的宋浩杰副局长，百忙之中，为我论文的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和指导。同时，也要感谢“中国基督教中等教育研究”的全体老师、同道，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也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治学之道。

最后，感谢与我同窗三年的各位同学，特别是林轶和蔡翼伦，大家在共同的学习生活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为这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留下了一道美好的回忆。

需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不过在此不能一一赘述。最后感谢陪伴我度过这七年复旦学子生活的每一个人，祝愿各位事事如意。在即将踏上社会，走上人生新的起点之时，我亦决心继续勤奋努力，不负各位的期望，也不负我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赵昕 2007年5月20日于北区学生公寓

# 文化传教的传承——从徐汇中学看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地区的文化事业



作者：[赵昕](#)  
学位授予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68096.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68096.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c42e0688-2296-4b51-b596-9e4d00732ad8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